



国关中层理论创新需受到我国学界重视

漆海霞

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往往伴随着国际现象的重大变化。当前,随着中国崛起和大国关系变动,出现了一些挑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新现象和新议题,例如:权力转移是否必然导致战争,和平崛起是否存在可能?俄乌冲突映射的世界秩序变迁与大国领导力的影响会出现何种趋势?这些议题都引发了全球学界的关注和思考。然而,上述现象并没有彻底挑战国关学界的传统宏大理论,而是从中层理论的角度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国关新现象与国关中层理论

在当今世界,新现象层出不穷,例如,全球化的过度扩张与逆全球化的出现、科技快速发展对社会与全球政治的挑战,中国崛起对世界秩序的影响等,这些问题是国关中层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

首先,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提出了新的全球政治议题。全球化时代,跨国人员的自由流动使难民问题和流行病扩散呈现新特征。货币的快速流通使各国金融管控和美国的制裁手段呈现新特点。同时,全球化时代下,一些国家贫富分化程度加剧,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抬头,各国内政不稳定性风险上升,进而可能通过对外强硬实现国内危机转移,导致国际冲突与战争次数增多。

其次,中国崛起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探索空间。例如,中国崛起呈现出了迥异于历史上其他崛起国的新特点,我国学者借鉴中国古代经验和思想进行了有益的探究,其中代表性观点有阎学通(Yan Xuetong)的

道义现实主义和秦亚青(Qin Yaqing)的关系理论^①。此外,中国当前的外交实践也推进了学界对现有理论构成反思,例如,韬光养晦与崛起策略,我国对伊朗和沙特矛盾的成功斡旋,中国“一带一路”和伙伴关系等外交构架的独特性,这些外交操作均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行路径。

二、国关中层理论的创新途径

如果说国关新现象有助于当前学界在中层理论实现创新和突破,那么究竟该如何着手实现呢?笔者认为,存在以下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学术界可以加强对一些核心概念的辨析。核心概念是理论建构的基石,当概念的内涵或外延存在歧义时,容易导致理论的误读和误用,这也是当前国关学界在中层理论中需要关注的关键之处。随着国关理论的快速发展,不同理论流派之间自成体系,相互衔接较少,导致存在一些内涵上比较接近的概念。对于这些概念,如果我们不加以仔细厘清,则可能会在理论构建中由于忽略概念差别而出现理论漏洞。

在此,笔者尝试列出一些常见的国关学界内涵上比较接近的概念。例如,在国家互动层面,威慑(deterrence)和威胁(threat)容易混淆;在国家评估方面,声誉(reputation)、信誉(credibility)和可信度(reliability)也存在微妙差异;在领导人层面,领导人的威望(prestige)与领导力(leadership)存在内容交叠之处。在体系与国家方面,国家的地位、等级、角色、身份等概念也常常混用。上述概念不仅存在定义上的差别,其背后的作用机理也不同,应用情境各异。因此,我国学界可以进行概念梳理,在校准不同概念之间异同的同时,辨析这些概念的作用机制和应用场景,为更深入的机理探因和理论探讨奠定基础。

第二种途径是对国关领域的新现象进行理论总结。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诸多新现象纷至沓来,对于这些现象的经验总结和概念归纳就是理论创新的源泉。例如,对于中美竞争,我们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并没有采取同

^①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Qin Yaqing, "Rule, Rules, and Relations: Towards a Synthetic Approach to Governanc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 No. 2, 2011, pp. 117-145.

盟理论中的传统选项——制衡或追随,而是选择两面下注这类规避风险的策略,对于这类行为,学者命名为“对冲”。^①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独霸局面,按照均势理论推断,其他大国会联合起来制衡美国,然而迄今并没有出现对美国的均势制衡行为,因此有学者提出软制衡、制度制衡等概念加以解释。^②

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升级,国关学界对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相关议题的重视程度也在加强。大国如何借助网络进行攻防战? 人工智能技术如无人机等对现代战争有何影响? 新技术如 ChatGPT 等对各国内政和国际秩序有何影响? 这些议题将是未来理论创新的重要方向。此外,在传统的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看来,相互依赖是有利于合作的机制。然而美国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时,借助相互依赖关系和产业链中的地位,使相互依赖武器化,进而产生了新的研究议题。

第三种途径是对传统中层理论的突破和挑战。基于上述对新现象的总结,我国学界不仅能创造新的学理概念和提出新的理论议题,也可以进一步找到传统国关中层理论的漏洞和解释力不足之处,进而实现突破。例如,传统同盟研究侧重于研究同盟的形成和维持及其对国际冲突的影响,如同盟困境理论等。然而,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华约的解体,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当前国际舞台上同盟的军事功能相对被弱化;而在一些非军事领域,例如制裁、谈判等,联盟似乎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传统的攻防理论也受到新技术的挑战,当攻防理论基于经典战例判断攻防平衡时,则相对忽略了新技术对战争爆发的影响。例如,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究竟是有利于进攻,还是有利于防守? 新技术下的攻防平衡和各国攻防认知会对战争进程产生何种

① 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第4—25页;亚力山大·科罗廖夫:《体系制衡、地区对冲与中俄关系》,载《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1期,第100—129页; Kuik Chen-Chwee, “How Do Weaker States Hedge? Unpacking ASEAN States’ Alignment Behavior toward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 100, 2016, pp. 159-185.

② 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45;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2-108;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46-71;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2008, pp. 489-518.

影响?

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传统的安全研究重点在于战争与和平,侧重于讨论国际格局、安全困境等机理。而在现实国际关系中,具体的互动手段和微观机理需要加强研究,例如,冲突爆发后各国采用的非军事手段如制裁、仲裁等,冲突解决中推进和谈的机制如国际斡旋、调停、维和等。上述现象都是国际舞台上常见的外交行为,也是中层理论突破的方向。

从学科发展阶段来看,当前国际关系学科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大主义的完整脉络下,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出现宏大理论的突破难度较高,因为系统性的理论学派的创建奠基于对之前理论从核心概念到作用机理的彻底反思,诸如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扬弃、建构主义对理性学派的颠覆。因此,彻底的理论体系性创新在目前国关学界较难实现,目前国关学界的理论创新重心应该在中层理论。基于上述创新途径的总结,笔者认为,我国国关学界在中层理论可以取得较多突破空间,既可以对概念进行梳理,也可以对新现象进行总结,还可以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大有可为之处。

三、结语

在国际关系风云变幻之际,我国国关学界要突破既往固化认知,发现当前新现象的新特质,实现理论创新。一方面,我国的外交实践和古代经验都为中层理论突破提供了新的思路来源。例如,春秋时期的称霸模式、朝贡体系的区域秩序维持、当前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和“一带一路”建设都为我国学界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我国国关学界的理论进步可以为全球国关学界的整体进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自从20世纪西学东渐以来,我国国关学界经过长期发展,在广泛引进和吸收国外理论的基础上,目前已经到了理论创新的新阶段。

基于上述认知,《国际政治科学》作为专业学术类期刊,希望伴随学术界各位学者的学术成长,推进我国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走向成熟,引领我国国关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理论创新,与学界同仁共勉。